

同时也需要注意,日本、俄国和中国三个亚太大国的政局当年都以动荡著称,发生着很多革命性的转变,往往不能据常理判断。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①他说的是中国,其实俄国和日本那时也处于类似的“革命”时代,许多历史面相洋溢着激情活力,带有显著的非常规性。尤其从济南事变到九一八之后的几年期,日本国内其实蕴涵着很多历史可能性,不宜以“倒放电影”的方式,仅从结果角度观察,以为都是往侵华一条路发展。

而列强间权利的纵横捭阖,既与竞争中的意识形态相关,又常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夹杂其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根据当时的思想、政治语境,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这中间的分寸,也是需要好好拿捏的。

抗日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夹杂着中外、国共等基本因素的合作与冲突。我们尤其需要关注那些明显带有内在紧张甚至应当是“不可能”的现象。例如,在举国民族情绪高涨之时,当政者何以还能提出并贯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何以在七七事变之前,有那么多应是国之精英的人,提出了以妥协换取时间的主张(有些主张甚至超过了后来汪精卫伪政权的让步),等等。这些看起来明显与世风、时风相冲突的观念、取向,不宜仅是予以定性的“评价”,而需要给予更认真的考察。

我总的希望,是以后的抗战史研究会把原本繁复的历史表现得更加多元,更加丰满。上面这些外行的看法,不知是否可以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参考。姑抛砖以引玉,并期待读者的教诲。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历史的叙述方式

茅海建

我的朋友高士华主编几番来信,让我参加《抗日战争研究》的笔谈。他也知道我个人离这个题目很远,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的坚持让我感到这件事情似乎是不可推辞的。对他来说真是“勉为其难”,对我来说,只能是外行来做“瞎议论”。读者一不小心碰到了,姑且当作“随便一说”来看待。

虽说是外行,但我对《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比较关注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的朋友高士华在主持(我在后面另外有话),其次是这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现在做成了学术性很强的杂志。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比较晚近的事情应该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论等领域中进行研究,他们有着比较大的倾向性;历史学会比较麻烦,因为它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中立原则,避免过度的倾向性。“抗战史”这个题目,有狭义和广义。从狭义来说,指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从广义来说,可以向前延伸到1894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可以向宽延伸到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以及同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可以再扩大到日本各界在华有“特殊目的”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以及中国各界的反应……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从明治以来,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7页。

日本对中国做过许多很不好的事情(当然也有好的),使中国在国土、财政、经济、社会等许多领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使中国的道路发生了改变,使许多中国家庭遭到了不幸。这些都是让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自然扩张的原因。

然而,历史学所追求的,不是义理上的正确,而是事实和真相。揭露和批判是重要的,但这种揭露与批判所依据的事实,是由历史学家来建构的。历史学家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不增不减,不丑化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从史料基础出发,从史实重建出发,建造出一块块结实有分量的石块。这是我们的学术责任,也是历史的叙述方式。至于这些石块如何垒成坚不可摧的长城,那是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的事情,历史学家似不必过多地将精力花在此处。长久以来,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义愤填膺的高论之下,似乎缺乏扎实的根基。数字是笼统的,事实是模糊的,比较少数的历史学家愿意做这些最为基础的事情。《抗日战争研究》似乎开始关注了这些,也正在推动这些,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虽说学术与政治不可分离,但做最大努力,提高杂志的学术水平,似乎也是学术杂志所需要的。

学术发展到今天,所有的研究都不能是单方面的。我们要注重本国的研究,也要注重各国的研究,尤其是政治对手与学术对手的研究。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史料,除了中文史料外,特别要注重日文、英文和其他语种的史料。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要自觉地意识到外国语言的重要性,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从历史的叙述方式而言,中文史料需得与日文及多种语言的史料的验证,方可被认定结论扎实;从学术争论的角度出发,能够批判对方的观点,非为善之善者,能够揭开对方的史料漏洞,方为善之善也。故善说者,能用多种史料;善战者,能去对方史料之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要自觉加强自己的史学训练,尤其是史料阅读能力训练。

只会用一国史料,不能成为研究意义上的巨作;虽有史料,没有史料阅读能力,甚至读错史料,只能成为研究意义上的劣作。《抗日战争研究》有责任帮助年轻的学者意识到他们的缺陷,促进和帮助提高他们的学术修养与学术功力。

还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对于中国和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是国家罪恶。从法理上说,从道义上说,都是不存在追诉期的。历史学家对日本国家罪恶的研究,是有着充分的学术正当性的。但是,战争过去了七十年,现在的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犯下战争罪行。历史的叙述方式不强调那些煽情的因素,而用更多结实可靠的研究成果,让今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读后能自然地发生那种史鉴的体会。而到了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学,才能功效达到最大。

以上所说的历史的叙述方式,都是史学家一般的史学精神。道理应是大家都懂的,真是说说也可,不说也可的。

最后,我还要说明,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对我的朋友高士华主编的祝贺与希望。

当今各大学与学术机构的评价体系,主要看发表,尤其要看在何一等级的刊物和出版机构的发表。这是无可奈何的,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这一评价体系下,许多学者,尤其青年学者,将发表当作最终的目的,生产出大量题目上有新意、研究上没有价值的论文与著作。而应对这一恶流进行制约的,是学术刊物、学术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有着正士风的功用。从学术史上来看,编辑的作用十分重要。然而,学界良莠不齐,编辑界也良莠不齐。一些坏编辑利用手中的发表权,从中谋利;也有一些刊物与出版社,在出版补助的名义下,接生甚至催生了大批学术怪胎。以致到了今天,学者们所看到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好的少,差的多,一肚子的怨言。也算是我命好,直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坏编辑,尽管也经常收到“代写、包发、通过”“核心期刊”的E信,但我听到的坏编辑的事例,经常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也因为如此,我见到学界的朋友去当编辑,一定会关注,一定会祝

贺。现在的学界真是需要好编辑!

由此而祝贺《抗日战争研究》这几年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由此而希望高士华主编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同仁们,都能当个好编辑,多发好稿子,多发年轻人的好稿子,以个人的微薄力气来抵制巨大的社会恶流。如果更多的编辑和编辑部皆是如此,那么学界的风清日丽是有可能出现的。

后面的这两段话,也请各位读者,尤其是各位作者与编者,姑且不要当作“随便一谈”来看待。

[作者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抗日战争研究亟待提高门槛夯实基础

桑 兵

近十余年来,不时参加各种名目的高层或高峰论坛。开始不大习惯,记得有一次即席发言,说是能否办一次基础论坛。在场的主客诸君都有些愕然,以为戏言。其实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是当真来说的。

好的学问多是金字塔式的,底部坚实,才能深固不摇。所以治学之道,要将热点冷作,将冷门做热。君不见数十年来各式各样的显学,大都陆续退隐,而一旦失去光环,似乎也就没有了吸引力。这与其说是相关领域学术价值的用尽或流失,毋宁说是没有了炒作的空间,赶场、投机以及凑热闹而来者便束之高阁,甚至弃如敝屣。而学术的挑战性,恰在铅华洗尽之后的素颜。这也就是治学首要讲究基础和门槛的重要性。那种以为有的研究领域可以不学而能,妄想轻易涉足或跨越,实在是自欺欺人或天大的误会。高来高去的夸夸其谈,看似玄奥,其实不过底盘不稳的飘忽。

抗日战争研究,顾名思义,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视角的学问。因为其他与此相关的国家,大都不能说是以弱敌强的抗,或是不到抗的程度。创刊人是历史的亲历者,深知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和国人的深远影响。而要想研究好抗日战争,又不能仅仅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的视野来进行。大致原因如下:

其一,一场战争绝不会是单方面的事情,战争的对手是研究任何战争的历史必须考察的对象。单方面单向度书写的战争史,作为特殊时期的教育是可以的,作为学术研究则显然很不足够。

其二,即使在中国一方,抗日战争也是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当时不免合中有分,现在仍然看法不一。所以,即便是中方的视野立场,也不那么单一。各自背后的牵涉势必影响到内部的分合。

其三,由于大片国土的沦陷,以及敌后战场的开辟,中国城乡的各阶层民众大都在战争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个人与国家的生死攸关,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每个人的经历,也成为抗战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四,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牵涉与英、美、苏乃至德、意的错综复杂关系。

其五,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场战争,除了抗日战争研究的视角,还有其他的不同视角,如中日战争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这样的分别因人而异,战时的对抗、对立、分歧,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延续。在这样的场合,不要说与人争胜,即使平等对话,也应该有所凭借。

凡此种种,都表明抗日战争研究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不可闭门造车,更不能自娱自乐。如果承